

中国译学状况回顾与反思

郭 著 章

回顾我国翻译史的点滴情形,有不少问题不禁令人深思。譬如:为什么早在一千多年前,汉唐文化会那样高度发达?当时的中国译学为什么能以佼佼者的姿态高高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什么到了后来,特别是近三、四百年以来,中国译学反而会基本上停滞不前,甚至在某些方面落后于西方呢?又为什么在近几年,特别是在近两年的我国译界会出现有所突破、开始振兴的势头呢?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我想我们应该从文化的角度,对我国译界出现过的和现存的译学思想、认识 and 理论进行一次重新思考,即历史和哲学的反思。反思过去,总是为了理解现在;为了理解现在,总有必要了解它的历史;而回顾过去,理解现在的目的,又总是为了未来的发展。本人就是本着这一想法与目的,根据几年来学习的心得,遂成拙文。

(一)

有关我国译学的状况,我想回顾与反思的是,中国译学充满着令人头痛的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现象。乍一看来,真有点“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如置身茫茫雾海,叫人“不识庐山真面目”而颇感莫衷一是,无所适从了。我国至今虽然尚无系统的翻译理论著作和一部完整的翻译史,但翻译文论却可谓洋洋洒洒,蔚为大观,翻译论集也开始出现煌皇巨著。对于这些历代译论,谁要是不厌其烦予以浏览,谁就会自然产生同感。这种各执一说、长期争论不休的情况,不仅出现在围绕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方法这些重大问题的讨论上,而且还出现在可译性等这些较小的或具体的问题上。

早在两千二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就开始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新兴的和没落的阶级都要从理论上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于是乎思想文化领域空前活跃,出现了儒、法等百家争

鸣、群星灿烂的局面。这些灿烂的文化巨星的学说涉及到包括译学在内的许多领域,他们的很多见解至今闪烁着真理的光辉。我国谢世不久的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在谈中国语言学史的时候,曾引荀子的一段与翻译很有关系的论述:“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这段话的意思,用王力教授的话说,就是:“人类既然同类,而又具有同样的感觉,人们的五官接触万物所抽象出的特征自然也无不同,以物比物,特征相似的也都相通,于是相约形成共同的概念,人类的概念都可以对应……万物加上了名称,这是依照汉族(诸夏)的习惯,其它不同的民族,应该依照这些名称,委曲地找出它们对应的名称来,这样就可以交流思想了。”也就是说:语言具有民族的特点,而思维则具有人类的共性。唯其具有民族特点,所以各个具体语言的形式和结构是不相同的;唯其具有人类共性,所以通过语言的翻译,不同的民族是可以互相交流思想的。用一句话说,翻译是可能的或可译性是根本不成问题的。对于荀子这位先秦的伟大哲学家在其名著《正名篇》中所阐述的这一理论,王力教授说:“直到今天,还是不可动摇的。”读到两千多年前我们这位先哲的有关翻译的绝妙好辞,不禁使我联想起在1986年第6期《读书》杂志上读到的一段有关老舍论翻译的“绝妙好辞”:他说,翻译这工作是极要紧的,但是它使我太痛苦——顾了自己,便损害了别人;顾及别人,便失落了自己。言语的不同没法使彼此尽欢而散。“……寥寥数语,道出了翻译工作的痛苦与艰辛。老舍的话可以说是论翻译的一段绝妙好辞。”如果把老舍的话作为他一个人一时的心得感受或经验之谈,可以说无不道理;可要是把它作为一段绝妙好辞,给人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感受,我却不肯苟同,因为,此论还在被人

引用,至少反映了不可译论的观点至今仍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若明若暗,时隐时现。

严复于1898年首次提出“信达雅”,虽可谓夏甄独造,自成一家之言,但若细心翻阅一下历代译论,反复对比,认真思之,便可发现,作为翻译标准的这一译学核心理论,并非自严氏始,而且在实质上,也未越出一个“信”字。严氏之提法只能算是一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具有继往开来意义的贡献。关于严复“信达雅”的这一思想,在其前后的大约上下两千年间,其表述方式一变再变,令人眼花缭乱。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现让我们回顾一下史实,对此便会感到豁然开朗。

1. 严复为了证明其“信达雅”的理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便引用先秦的《易经》和孔子的话作为这三个字的根据:“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2. 三国时,支谦写的《法句经序》中,已有了较为直接地谈论翻译的文字。其中所说“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当令易晓,勿失厥义……今传胡义,实宜径达……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解释起来,无非是“直译求信”的意思。

3. 东晋道安所提“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说的也无非是力求直译,务求忠实,仍离不开一个“信”字。

4. 到了南北朝,译界第一流派匠鸠摩罗什主张,只要能存本旨,就不妨“依实出华”。他所译的《法华经》达到了“曲从方言,趣不乖本”,这都说明,此时译家,从理论到实践,除求“信”之外,已开始求“达”求“雅”了。

5. 到了唐代,由于我国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即印度佛学等等原因,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我们的翻译事业至玄奘已登峰造极,在翻译理论上提倡以“信”为主,并首倡音译原则和意译,“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但可惜的是,唐代以后的六、七百年间,由于天灾人祸频仍至今听不到这一时期有关译学的什么新识高论。

6. 时至十七世纪,时代变了。在国内,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国外,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高度发达的西方文明后来居上,在不少方面超过了中国。中国的有识之士非常敏感,发出了学习西方的大声疾呼。于是开始了中华民族第二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即我们所说的“西学东渐”时期。在沉默了几百年的中国译界,人们又听到

了新的声音,譬如当时的文化巨星、一流学者徐光启,曾发出过“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的名言。大有“我劝天公重抖擞”的劲头。然而不幸的是,这次并没象第一次吸收印度文化那样顺利,而几经坎坷,走过了一条漫长、曲折和极为艰难的道路,直到现在还远未结束。在至今尚未结束的“西学东渐”时期中,“天公”降于译界的最有影响的“人材”当推严复。他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集前人译学标准之大成,第一次明确提出“信达雅”,八十多年来在我国影响之大,可谓是空前的。现继续列举事实,看看严氏以来较有代表性的各家译论。

7. “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方面,一当然是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鲁迅先生此论,未出“达信”二字,甚至还包括了“雅”字。

8. 瞿秋白论证翻译是可以做到又信又顺的。我想这里的“顺”当与“达”同义。

9. 林语堂提出的“忠实标准、通顺标准、美的标准”,也只是对“信达雅”的一种解释,自然不及严语简炼。

10. 当代一流学者郭沫若,智慧超人,却一直主张以严复的“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

11. 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实际上可与“信”的标准并行不悖。

12. 译莎士比亚名闻遐迩、成绩卓著的朱生豪之“保持原作之神韵”的提法与傅雷的“神似”说相比,基本上是一个意思。

13. 钱钟书先生提出的“神姿致依然故我”和“化境”的标准,无非是指译文要做到尽善尽美,力求达到全“信”的高度。

14. 艾思奇,以哲学家的头脑,在如何理解和看待“信达雅”上,似乎比别人站得更高,他说:“翻译的原则总不外是以‘信’为最根本的基础,‘达’和‘雅’的对于‘信’,就象属性对于本质的关系一样,是分不开的然而第二义的存在。”

15. 朱光潜先生说:“严又陵以为译事三难:信,达,雅。其实归根到底,‘信’字最不容易办到。原文‘达’而‘雅’,译文不‘达’不‘雅’,那还是不‘信’;如果原文不‘达’不‘雅’,译文‘达’而‘雅’,过犹不及,那也还是不‘信’。所谓‘信’是对原文忠实,恰如其分地把它的意思用中文表达出来……稍有翻译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极难的事……译文也只能得原文的近似。绝对的‘信’只是一个理想,事实上很不易做到。”

16. 还有不少翻译家和研究家,为了“补弊救偏,

调整旧的标准,另创新的尺度。”以“评点式、随感式、印象式”的就事论事的微观分析方法,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名目纷繁”的标准,诸如:形似意似神似,形美音美意美,信义信达信雅,达意传神文采;还有什么信达化,信达切,忠实通顺,等等。真是不一而足。

至此,关于两千年来我国译界所谈的翻译标准的讨论应该“休”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越出“信达雅”的雷池,用一个“信”字取而代之?因为“信”就是“忠实”,保持原文的信息。“信”与国际上的比较通行的翻译标准,如苏联人费道罗夫于三十年前提出的“等值”理论可以封应起来。尽管它难于达到,然而考虑到“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欲求翻译精益求精,它又是相当理想的,应该将其肯定下来,作为继续使用的翻译标准。现在,在肯定“信”字的同时,应该把我们的精力转向寻求具有突破性的翻译理论和译评方法。

(二)

实际上,在近年来的我国译界,与全国各界一样,开始出现了令人振奋的大好形势。译界开始涌现新人,他们勇于越出雷池,对被长期奉为圭臬的传统理论,大胆地提出了挑战,发表了有所突破的见地,现归纳如下:

1. 这些敢于开创译学研究新局面的人的特点之一,在于善于虚心学习前人成果,然后以独立思考的头脑,对已有的理论持批判地继承态度,“去粗取精”,做到“褒之贬之,皆得其正”。譬如说,费道罗夫的“等值翻译”理论,在我国的五十年代,就有人介绍了进来,但由于遭到非难,或曰“理论上就否定了等值翻译的可能”,或曰“未必就切合我国的翻译实际”等等而没得到支持,加上后来的种种原因,结果不久就“自生自灭”了。而今,已有人利用国际上语言学的新成果,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较为客观的翻译批评方法和较为实际的翻译实践方法,认为:我国传统的‘信、达、雅’理论,只能在定性方面提标准,却无法做定量分析。而翻译等值理论是建立在近代语言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的。它综合运用传统语言理论、结构语言理论、交际功能语言理论以及转换生成语言理论,不再单纯按线性序列研究语言,而是把语言按静态和动态层次,纵横切分成十五个平面,立体地研究原作与译作的等值关系。按照这种理论,对译作的价值,可以进行定量

定性分析,比较准确地判定译作的等值量。”

2.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对于我国在译评上只能用作定性分析而又不免失之于主观的传统翻译标准“信达雅”,“神似”,“化境”云云,认为:翻译理论不应当只停留在“传神”,“神韵”的一般评论上,或仅仅满足于“妙笔生花”、“文采斐然”等带有较大主观性的褒贬毁誉,而应当设法给风格翻译以客观的、科学的解释。

3. 近来,有人颇有新见,认为:“诸家对‘信、达、雅’标准所持见解不尽相同,分歧颇大,其争论之症结究竟何在?这场争论延续至今近九十年,仍无定论,为什么?笔者认为,长久以来,翻译理论研究和建设之所以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原因在于没有认真地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理论的建设工作。”

关于语域的理论,在国际上早有人提出,在国内汉语界,也有人开始研究。严文对英汉文学语言进行语域分析,主要援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伦敦功能结构主义学派主要代表之一哈利戴(Halliday, M. A. K.)的语域理论,结合当代美国译界执牛耳者奈达(Nida, E. A.)的理论,对文学作品的译文质量,提出了七个步骤的批评方法:①找出原文在一般情况下的上下文语域特征;②列举原文的在音韵、词汇、句法和句群四个等级上出现的一切可能的语域标志(register markers);③阐述原文语言学项目所标明的实际语域特征;④推断作者旨在传递的风格信息;⑤列举译文的语言学项目和语域意义;⑥估价译文所保存的风格信息;⑦提出必要和可能的改进意见(亦根据语域的理论)。从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样的译评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主观褒贬,用科学的语言较为可信地估价译文的“信”度和“等值”量的大小。

(三)

关于我国译学的状况,特别是关于“信达雅”的情况,我们在前面回顾了很多。现在我们要问,这个长期用于评价译文不免失之主观的标准却又被译界奉为圭臬,在文化和学术上有没有原因?回答是肯定的。从渊源上讲,我国译论来自我国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所以,类似于“信达雅”的许多提法原是取自文论和美学用语。严复所援引的作为“信达雅”根据的先秦之言,原是文论的观点,他所说的“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便是明证;“传

神”，作为人物画的美学要求，早已为东晋顾恺之所首倡；傅雷提出“神似”、“韵味”等，也是根据有关绘画的理论。……这些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提法，都有一种寓意模糊、难于理解的毛病。因此，后人的解释难于避免见仁见智和主观武断的现象。季羡林教授曾说过一段话，正好能够支持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他说：

“我们讲文艺批评要神似、形似。……中国文论讲究韵，即神韵，讲求味。……我们根据印象，如司空图的《诗品》都是些印象。什么雄浑、沉着、洗炼、典雅、豪放、含蓄、婉约等等。中国文论史上，有的人主张‘神韵’，也有人主张‘性灵’，就是讲有‘性灵’，就是好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他有‘境界’说，认为有‘境界’就是好诗。……你说什么叫‘雄浑’，讲不出来。‘性灵’、‘神韵’、‘境界’，……我们的这些名词，包括司空图的《诗品》，说不清楚。一看就懂，一问就糊涂。……有点玄乎，各有各的理解”。季羡林教授的这一番话使我们更加明白：我们广大的译界同道，都应该象近两年来在译

学研究上有所突破的一代新人一样，不能只是漫步于迷宫般的文论、美学的神殿，还应该迈出自己的双脚，登上现代语言学的厅堂，透过其明亮的窗口，以开阔的眼界来观察译学的大千世界。

最后，再让我们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作出回答。我国的古代译学之所以能在唐朝登峰造极，是因为当时整个的文化界都很发达，并引进外来文化。但在近几百年，西方文化崛起，中国却因为长期闭关自守和其它各种历史惰力，形成了思想文化的一滩死水。但在近两年，译学研究之所以有所突破，主要是得助于我国推翻“四人帮”以来的大好形势；党中央实行了英明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一系列改革政策。抚今追昔，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各项英明政策，变封闭型的思维方式为开放型，正确地对待中外文化，坚持学习，坚持改革，即确切地了解和利用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定可不断攀上中国译学研究的新高峰！

（上接127页）

三是运用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站在新的高度，探索学科的新发展。吴于廑教授主编的《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武大出版社出版），“在开辟世界历史研究的新途径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尝试”，“迈开了史学研究的新的也是坚实的一步”。在以往的世界历史学科体系中，或者“欧洲中心”占主导地位，或者是“国别史相加”十分突出，难以窥观世界历史全局的发展进程和规律。该书的作者从宏观的高度研究世界历史的发展，从微观方面进行精细探讨，“宏观综览全局，但不空泛”；“微观精于专题，但不狭隘”。他们广泛采用综合比较的方法，“将历史发展的横向联系与纵向联系”融为一体，“综合比较，视野开阔”，史学界称之为“使世界历史成为真正的全世界的历史”。获奖项目中，不少作者还将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等研究理论和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从而开辟了一些新的途径。

四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和社会主义的科研方向，努力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一项创造性的劳动。但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去意味“求新”，必然要偏离社会主义的科研方向。获奖项目的作者，都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向科学发展的高峰进军，使科研成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以取得较好的社会 and 经济效益。王玄武教授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武大出版社出版），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较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和方法，针对当代大学生和青年一代的思想活动特征，探索了11届3中全会以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鲜经验，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初步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学科体系。该书是我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第一本教委推荐的基础课教材，问世后立即受到社会和学校师生的欢迎。在1986年北京书展期间，被列为畅销书，发挥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姜延常）